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

●冯雪艳

摘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发展观,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不断践行和丰富可持续发展理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发展定为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评价指标、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全面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对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演进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经济繁荣的背后,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日渐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严峻形势之下,人类不得重新审视所走过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意识到以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道路难以为继,人类应该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向人类描绘了这样的新道路——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热烈响应。

中国政府敏锐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的大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适合国情的正确选择。1994年,中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从此拉开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序幕。经过党、政府和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经贯穿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大规模开展为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可持续发展已经在国内形成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经济学界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一、可持续发展的形成过程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增长→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历程,可持续发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

1. 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背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古已有之,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则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世界局势相对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寻求富国之路,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股“经济热”。各国政府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和军事竞赛,短时间内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潜伏着深刻的忧患与不安。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土地沙化、臭氧层锐减、温室效应等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来自自然的危机,审视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八大公害”事件,更加迫使人们反思自身行为,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2. 可持续发展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深刻揭示了化学杀虫剂的滥用对生物界和人类的致命危害。此书如一声惊雷,使得人们开始惊醒并关注环境问题。此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各种观点和学说不断涌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观”,向人们说明了经济发展中生态问题的严重性。1968年,罗马俱乐部成立,它是一个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主要研讨人口、资源、环境、污染、贫困等全球性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并提出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该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一般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带有悲观色彩,其结论也值得商榷。但该报告的积极意义也毋庸置疑,它向人类揭示了资源环境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其中所论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雏形。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第一次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的事务议程,被认为是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里程碑。1980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以审查世界环境发展的关键问题,并帮助国际社会确立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987年,该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世界范围专家3年多深入研

究和充分论证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和深入阐述。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EPD)，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矗立了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两个纲领性的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世界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走向行动，拉开了世界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实践序幕。

3. 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明，“天人合一”的哲理和“人地共生”的长期社会实践使得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和谐统一。然而到了现代，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也走过一段“弯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积贫积弱，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党开始领导人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但漠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更是日益突出。当时的极左思潮宣扬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没有污染”。197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目的却是去“斗争”，揭露发达国家企图阻止落后国家获得发展的“阴谋”。但这次会议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环境启蒙，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于北京召开，会后迅即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终于蹒跚起步了。

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争鸣

1.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衡量一国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状况或程度，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稳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随着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从未中断。国际上相继提出了一些较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和政策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比较流行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联合国的CSD和STAT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环境科学委员会的SCOPE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世界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等。另外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资助建立的“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模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人类活动强度指标”、以及加拿大国际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环境经济持续发展模型”等。

国内学者也对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和城市层面上。在国家层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21世纪议程》，该报告详细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1999年中科院发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包含5个等级、208个指标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随后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和尺度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2003

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设计了一套“五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五个等级。目前，这套指标体系在国内的影响最大。一些学者还基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差异探讨了不同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代表性的是中科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毛汉英构建的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卢武强、张坤民等。

2.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关于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何实现，国内学者围绕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广泛探讨，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有梁言顺提出的“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张孝德和钱书法构建的“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焦必方倡导的“环保型经济增长模式”等。近年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相继出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于循环经济的具体发展模式，诸大建认为，以往中国所走的A模式，即高消耗、高排放的强物质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鉴于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B模式，即经济与环境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很难在国内推行，从而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陈钟武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曲线比喻为“环境高山”，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基本翻过了“环境高山”，但经济增长造成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发展中国家的正确选择应该是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环境高山”的半山腰穿过去，从而避开环境污染最严重的阶段。金涌等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技术条件下，C模式是可以实现的，而通过“隧道”方式水平穿过“环境高山”还难以达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爬坡”方案，即当GDP和科技水平同时提高时就能平稳爬过山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低碳经济思想的雏形来自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提出的能源经济革命论。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大背景密不可分，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推进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国外很多国家如英国、日本、欧盟、美国等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如制定国家战略、政策立法、经济调节、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应采取多样性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模式包括发展低碳产业、低碳农业、低碳工业、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低碳技术以及通过生态环境控制的方式建设低碳经济，比如发展森林碳汇、扩大生物固碳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例如美国总体奥巴马上台后明确提出“绿色新政”、欧盟的《欧盟2020》战略、日本推出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韩国的“低碳绿色增长国家战略”、新加坡政府发布的“可持续的新加坡蓝图”等。这些国家希望通过这些绿色政策使本国经济实现绿色复苏，从而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关于中国绿色经济的相关问题，包括绿色转型、绿色新政、绿色城市、绿色建筑

等,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其讨论都是针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同侧面或是特定时期的任务而展开的,目的都是为了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3.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战略是对事关全局性的、长远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的谋划和部署。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是指,为使当代的发展不牺牲未来几代人的需要而保证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良性循环所进行的全局性决策。故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内容,是一个广博而复杂的理论体系。

1994年,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公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级行动纲领,确立了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和各个领域的主要目标,其内容大体分为四部分: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纲要》明确提出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陈耀邦在国内首次出版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指出了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重点分析了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1999年,以牛文元教授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出版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围绕“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条主线,构建了包括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结构体系。此后,每年该课题组都出版一次《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在国内的影响较大。

4.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其他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政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内著名经济学者陆百甫、吴敬琏、张卓元、林毅夫、郭克莎等从不同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归纳起来学者们研讨的重点主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紧迫性和重要性、途径和方法、障碍和难点等问题。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包括人口政策、资源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经济政策等,其中以政府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工业的持续发展、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也有较多论述。关于消除贫困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颇丰。

三、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简要评述

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经济阶段的原因,我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极其有限,把西方国家倡导的

环境保护当作一种“阴谋”加以抵制,大力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经济发展引起的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全力推进可持续发展。高层的重视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使得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多有益成果,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呈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一个完整的可持续发展学科体系正在搭建。在实践中,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逐步形成了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环境污染治理和资源生态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效;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低碳经济试点、循环经济试点、生态农业试点、清洁生产试点等进入规范化阶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主流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都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过研究,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第二,有关可持续发展,以及相继出现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学者们对其概念和内涵存在争论,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概念的模糊性反映出人们对其认识的有限性。第三,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比较宽泛,涉及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各个方面,但是现有研究要么是基于某一方面出发,要么是自说自话、就事论事,研究缺乏统一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第四,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原则,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是一个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问题,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实践性,要切实结合中国的实际,不断加强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或是生搬硬套现有理论以削足适履。

参考文献:

- [1] 毛志锋.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对策[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 [2] 张卓元.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1949-200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3] 曲格平. 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回顾及思考(回顾篇)[J]. 环境保护,2013,41(10):10-17.
- [4] 曲格平. 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的道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三个路标[J]. 环境保护,2002,(6):11-15.
- [5] 洪银兴.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6] 陈月英. 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0,(5):50-52,25.
- [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JY172);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CJJ095)。

作者简介:冯雪艳(1989-),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8-03-21。